

# 一錯再錯的梁游史觀

## ——談「南京大屠殺」的悲劇

趙雨樂 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

梁游宣誓風波，引發的不單是圍繞議員資格的釋法問題，事件更引往深層的國族歷史解說，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當今謬論與歪理已然充斥香港社會，就如癌細胞潛藏於身體，積弊日久而不予正視，終至無可救藥之虞，市民大眾得予以防範。筆者以前總認為此等歷史怪論，只會出自侵華日軍、右翼政客口中，「中國豬」的貶詞是列強加諸我國的人身侮辱。現在，則由新晉「本土派」人士重新演繹，不禁疑問：若非旨在賣國與顛覆，後者何以能繼承前者衣鉢？不但如此，「泛民」支持者在報章大談梁游行動情有可原，指「無非是針對共產黨政權，作出民主的良性互動」，更喻三百學者聯署為政治服務工具云云。此等言論，不分黑白對錯，既忽略了知識分子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的理性判斷，也漠視學者解讀史實的專業態度。

江陰，全力阻截日軍西進。半個月後廣德失守，日軍向南京右側包抄，形成對南京東南至西南面合圍之勢。12月1日，江陰失守，南京東面亦被日軍進佔。日本大本營見機不可失，在當天即下達第8號敕令，訓令「華中方面軍司令官須與海軍協同攻佔敵國首都南京」。在日軍發動總攻擊下，國軍決定以總兵力10餘萬固守（主要包括第74、66、83軍，以及第87、88、36師），進行殊死的南京保衛戰。

最終發生，中國死難者近30萬，凡中華民族的兒女都視此為國難，無不哀痛悼念。



趙雨樂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翻閱這段歷史的人，應具備基本的認知能力。與其歸罪1937年未鞭長莫及，編入國軍系統而人數有限的紅軍，倒不如認真考究作為軍事總指揮的蔣介石，如何審視對日作戰的時間表，並制訂何種對應的戰區方略。

在此3年之前，共產黨遭蔣介石五度圍剿，經歷了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抵延安的中國工農紅軍元氣大傷，所餘兵力不過46,000人。1937年8月22日，依據國共第二次合作協議，工農紅軍在陝北的主力且被編入國民政府軍的母體，成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又改稱軍號為「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它的主要軍事任務，是作為第二戰區序列，在閩錫山的管轄下，進入晉北參與游擊戰鬥。

從種種跡象顯示，蔣氏從未重視孫中山先生聯俄容共的政治深意，卻孜孜於各種不必要的清黨運動，以至黨內外離心對立者多。對於善於掌握中國國情，軟硬兼施的日本來說，軍閥混戰、國共內耗無疑是它入侵中國的最佳時機。30年代後期，日本派駐華北晉冀察，華中寧滬的軍政商以及大批情報人員，已視中國為砧上肥肉，隨時劍指南京。從盧溝橋戰事開始，迄上海戰役失守，國軍精銳部隊損耗達三分之一，為何慘敗如此呢？答案是他行軍過於自信，錯以為日漸虛弱的防守空間，可以長期換取打擊對手的時間。

紅軍的另一核心兵力是新四軍，是當日未隨大隊突圍長征留在南方的部分游擊隊，兩黨在10月達成抗日協議後，便把散落在江浙、兩湖、江西、福建、廣東等八省紅軍和游擊隊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作第三戰區戰鬥序列，擔任蘇北、皖南地區的游擊工作。同年12月25日，總數只約1萬人的新四軍軍部始在漢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其後又移至皖南歙縣。無論是八路軍或新四軍，紅軍從裝備、軍服以至軍餉，均依國民革命軍的編制，分統於南北不同地域。可以說，在1940年發生「皖南事變」，國共關係轉趨惡化以前，紅軍直接受政府軍節制，以便策劃統一抗日戰線。

### 「青年新政」已淪為笑話

歷史已說明蔣氏的安撫政策是雙輪的決定，設若將「剿共」精力，投放於國共合作的建設格局，遵照軍事專家意見，及早導入歐洲先進軍備及大戰略來強化國內軍事體系，日本未必會貿然進犯。「南京大屠殺」是中華民族至該大徹大悟的歷史教育，它告訴我們唯有在民族內部團結的情況下，中國才不受外侮。

眾所周知，蔣介石「先安內，後攘外」的政策，令他長期陷於與共產黨對立的模式之中。按蔣氏豐富的軍事經驗，也料到早晚與日本必有一戰，而且戰爭爆發，日方將輕易取得華北與華中的控制優勢，使國民政府不得不作遷都西安或重慶的多方考慮。「南京大屠殺」慘劇

游梁看錯的，不只是歷史研究中客觀的述事時序，硬要將「共產黨」標籤為中國人民的劊子手，對中國歷史也缺乏史家錢穆先生所說的溫情與敬意。一旦受人誤導，每把歷史材料當為政治揶揄的工具，偏偏又學藝未精，錯漏百出。如此下去，梁游及「青年新政」只會逐漸淪為公眾訕笑的對象，失落於政治參與的高地。

### 「泛民」包庇梁游 不分黑白對錯

政治與學術本來相去甚遠，但從政者一旦運用學理，以圖說服人民參與抗爭運動之時，便必須明白天秤的兩極存在平衡的真理，總要自省是否具有相應的道德和法理依據，才可承載政治的重任。梁游歷史知識到底有多少，師承自何方何派，本人並無興趣理會。但是，歷史時序錯亂如此，並機械地歸咎於中央政府和梁游英管治，與栽贓嫁禍的慣匪無異。

### 游梁述史一錯再錯 如栽贓嫁禍慣匪

驟眼觀之，指摘繪形繪聲，未涉釐清此段歷史的人，很容易因國共其時對立，信以為真。然而，事實是否如此呢？評價兩黨是非曲直總有個譜，不能抽離時代背景胡扯一通。游梁述史一錯再錯，臻至毫無愧色的地步，本人不妨在這裡講授一堂中國近代史，只述「南京大屠殺」的背景，便知錯謬之處甚多，其他游梁「偉論」留待下回駁斥。

### 「南京大屠殺」昭示民族團結才不受外侮

歷史時空，可追溯到1937年「七七事變」後的中日對峙格局。是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結束，日軍從華北迅速推進華中戰線，11月8日，日軍兵分兩路：一路以上海派遣軍之第9、13、16師團牽制沿滬寧線增援的中國部隊，另一路以第10軍之第6、18、114師團和國崎支隊向太湖以南集結，以切斷國軍的退路。是月中旬，中方遂派第23軍兩個獨立旅團由四川趕赴廣德、泗安等處，並委第57軍的第112師和自滬撤兵的第103師固守

## 商人特朗普終要面對現實

劉斯路



特朗普的本質是商人，因此他必然比一般美國的戰略家更市儷地計算中美關係的利害得失。誠然，好的商人也有長遠的戰略眼光的，但是從特朗普還未上台前的頭三腳看，他喜歡口出狂言、譁眾取寵、標新立異，如一般網民似的發網文施政，什麼招式都亮出來。國際交手，怕就怕「無聲狗咬人」，怕就怕表面示好暗中下絆子，怕就怕公開說友好合作實際則是遏制對抗。所以說，特朗普公開下戰書，是好事，之後他還是會跟他的前幾任一樣，計算到和中國保持合作關係更符合美國的利益。

事實上，奧巴馬卸任前簽署「2017年國防授權法案」，首度允許未來美國國防部助理部長以上級別文官及現役軍官赴台交流，這被認為是1979年美台「斷交」以來，雙方提升軍事交流級別的一次突破，這是把特朗普可能會做的事提前做了。北京也不示弱，派出遼寧艦編隊首次衝出第一島鏈，出擊西太平洋。國際軍事專家稱，如果單純從噸位看，這支航母編隊全球最大，在規模上甚至超越美軍航母戰鬥群的一般配置。遼寧艦編隊2艘核潛艇前出，6艘驅逐艦伴其左右，1艘快速支援艦尾隨，航母駐有艦載機聯隊。而美軍航母戰鬥群一般配置包括1艘航母、1艘巡洋艦、3艘驅逐艦和1個艦載機聯隊。自然，中國的航母編隊沒有經過實戰，艦載戰鬥機也不如美軍。但是，此舉已經充分顯示，今日的中國海軍已經今非昔比，特朗普不會視而不見。

前美國總統里根上台之初，也曾大放厥詞，聲稱欲與中國大陸斷交，和台灣重新建交，一度引起島內亢奮。但等到他充分明瞭國際局勢和美國利益所在，反而與北京簽了「八一七公報」。小布什執政之初，也大大聲稱美國會盡其所能的協防台灣，聽得陳水扁諷刺以為有機可乘，不斷推動法理台獨，升高台海緊張。但小布很快發現這樣做有損美國利益，後來更兩度爆粗口，把陳水扁定位為「麻煩製造者」。此後，美國更明確了「一個中國」紅線所在。到了克林頓時代，他也在競選時和執政初期傾向台灣，再次令台灣受誤導。但他之後去大陸訪問，發表「不支持台獨、不支持一中一台的兩國論、不支持台灣加入以主權國家為條件的國際組織」的「三不政策」，更壓縮了台灣的空間。

如今，特朗普與蔡英文通電話，公開質疑與挑戰「一個中國」來逼北京在中美貿易談判上讓步。這是特朗普商人本質的典型暴露。他用人談判模式打台灣牌，也就是把台灣當交易商品或是籌碼，一旦特朗普了解中美合作利大於弊的情況下，會把台灣利益犧牲掉，台灣可能會從戰略的「棋子」變成



中美兩國有龐大的共同利益，包括緊密的經貿關係。

「棄子」。特朗普很快會明白，第一，台灣問題是異常敏感的問題，北京絕對不會讓步，這張牌絕對打不得。第二，良好的中美關係其實符合美國的利益。「一個中國」的政策也並非大陸強加於美國，而是美國基於國家利益考量作出的最佳選擇。第三，特朗普執政的首要任務是重振美國經濟，良好的中美關係實際是有助他的夢想。他應該很明白，中國大陸是美國企業家、頂級大公司包括他的家族最矚目的海外投資地與消費市場。所以，特朗普上台後，中美關係製造摩擦是免不了，但是習近平主席說得好，「中國不惹事但也不怕事」，絕不會隨着特朗普這個商人的言論起舞。

## 戴耀廷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丁煌 執業大律師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

2013年，戴耀廷煽動的違法「佔中」，給香港帶來難以收拾的混亂。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戴耀廷又拋出「雷動計劃」，干擾選舉，為反對派爭取最多的議席。戴耀廷這個「政治學者」的目的不言而喻。



丁煌

如今特首選舉即將進行，戴耀廷又提出，反對派選委手握325席提名票，可要求特首候選人承諾，以撤回政府對4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的司法覆核，換取反對派選委的提名，這可是明目張膽進行赤裸裸的政治交易！

多名律師嚴正聲討戴耀廷的言論，認為已觸犯選舉舞弊、妨礙司法公正以及藐視法庭。而且，戴耀廷並非司法覆核案中的任意一方，對於正在進行的案件發表建議，必定對案件審理帶來影響，明顯妨礙司法公正兼藐視法庭。另一方面，根據《防止選舉舞弊條例》，任何人向他人提供利益而導致其人受之影響而投票，便構成選舉舞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戴耀廷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與法治社會中，法律是社會最高的規則，凌駕一切。「凌駕一切」的意思是指，任何人包括行政部門、立法部門以及司法機構皆必須遵守。政府提請司法覆核劉麗、姚松炎、羅冠聰和梁國雄4名議員的議員資格，是依法辦事的體現。

與法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人治。戴耀廷居然為了壯大反對派的勢力而出賣法治，出賣香港的核心價值。難以相信，一名接受法律專業訓練的人會出賣法治。一個人連自己的信念都可以拿來交易，那還有什麼不能出賣？

相信很多人都聽過古時德國民間的傳奇故事——浮士德賣靈。浮士德把自己的靈魂抵押給魔鬼，以滿足知識、權力、地位或金錢等慾望。結果，死後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與靈魂相同，主權也是非賣品。主權是一個國家對其管轄區域所擁有至高無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權力，是立法、司法、行政的權力來源。香港特區的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皆來自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授權。基本法賦予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香港特區的行政長官選舉，旨在選擇最能代表市民利益的人管治香港，行政長官選舉豈容交易。

正如梁美芬教授所言，戴耀廷煽動選委以身試法，重蹈「佔中」「覆轍」，將香港推向萬劫不復的深淵。無識鼠輩，禍害社會；有識無德者，摧毀社會。建議戴副教授，適時復修道德課，以天下蒼生為念。

## 發揮專業服務優勢 開拓新市場

蘇錦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時光荏苒，2016年轉眼間走到最後一個星期，大家不免隨俗，回首過去，展望未來。去年今日，準備《施政報告》的工作如火如荼，加強支援專業服務正是重點之一。2005至2015年的10年間，專業服務對本地生產總值的貢獻由3.5%上升至4.9%，增幅達四成；行業平均每年增長9%，速度較金融服務及貿易和物流行業增長更快。我們對專業服務行業的前景充滿信心。

人才是香港最寶貴的資源，在在彰顯於我們的專業人士，他們的專業操守、能力及國際視野深受稱許。香港雖小，現已成為全球第14大商業服務輸出地，就是人才實力的明證，加上雄心宏圖，我們一定可以走得更前、更遠，大展拳腳。

無論是個人或行業的發展，與天時、地利、人和總有關係。英語的說法是right place, right time; 如果能夠加上right people, 就更是無往而不利。

隨着國家的發展穩步向前，新興經濟體的增長愈見明顯，各方對高增值專業服務需求將會愈見殷切。面對這樣重要的時機，我們必須充分發揮獨特優勢，鞏固香港作為內地及鄰近地區企業打入世界市場，以及國際投資者拓展亞洲以至其他地區業務的首要合作夥伴角色。

香港已發展為成熟的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基建完備的大都會，處於亞洲的戰略位置。多年來自身的發展、建設，加上協助海外和內地企業來港營商、集資，以至成立地域總部，為我們的專業人士帶來了無可比擬的經驗和歷練，有充分條件吸納鄰近地區對高水平專業服務的需求。

政府的角色在於大力推廣本港的優勢及專長，協助業界開拓新市場，和支持業界不斷提升水平，為把握商機作好準備。今年1月《施政報告》公佈為數2億元的《專業服務協進支援計劃》（《計劃》），正是政府這方面工作的重要一環。

受惠於二戰後國際貿易自由化，我們的專業人士對進軍境外市場毫不陌生。而過去30多年內地改革開放，商機不絕，政府近年更透過不斷加強CEPA的內容，為增長提供主要動力。國家「一帶一路」的倡議，將會主宰未來數10載的發展機遇。

《計劃》在上月24日正式推出，旨在資助本港專業服務業推行非牟利項目，以加強與境外市場相關行業的交流和合作、推動相關的推廣活動，以及提高本港專業服務水平和對外競爭力。香港註冊、非分配利潤的專業團體、工貿組織及研究所都可向《計劃》申請資助。

受惠的專業服務行業眾多，既包括傳統的專業服務，也涵蓋近年發展迅速的行業。《計劃》對資助非牟利項目的類型並沒有特別限制。我非常鼓勵各機構提出切合行業需要的項目。過往類似資助計劃下的項目便包括對外聯繫及訪港活動、專業人士交流計劃、能力提升項目，以及市場調查研究和建立專業網絡的項目。

成功申請《計劃》資助的機構可獲資助項目成本最多90%，或300萬港元，以較低者為準。這個較高的資助比例，相信有助更多機構參與《計劃》，尤其是經驗較淺和資源較少的機構。《計劃》下每個項目一般為期可以長達3年，方便參與機構舉辦較大型的項目。《計劃》一般每年會接受4次申請，第一期的申請將於明年2月28日截止。接獲的申請將由各界人士包括商界、專業人士及學術界等組成的評審委員會審核。

專業人士向來是香港在外地的最佳形象大使。政府期望成為業界的強力後盾，在這個本港專業服務行業向境外市場邁進的關鍵時候，為業界提供有效支援。我們期待《計劃》能有助各位與境外夥伴交流合作，作好準備把握和開拓新商機。祝願我們在2017年及往後，協力同心，向前邁進，一起貢獻香港的未來發展。

## 未來特區政府仍須全面清除「港獨」

陳曉鋒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博士 城市智庫研究員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3日下午接受特首梁振英任內最後一次述職，充分肯定他和特區政府的工作，特別讚揚港府遏制「港獨」及依法處置街頭暴力活動，嚴格按照基本法、人大釋法及香港法律辦事，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了香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在會面中，習主席至少六處提及「一國兩制」，強調「一國兩制」符合國家利益和港人福祉，必須共同努力確保其「不走樣、不變形」；多處兩次提及遏制「港獨」，中央政府堅定支持香港政府依法遏制「港獨」活動，這足見反「港獨」對保障「一國兩制」成功落實意義非凡。

香港目前依然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和亞洲最大直接外來投資目的地，國家高度重視香港的經濟民生，期待香港社會保持長期的繁榮穩定。在中央的支持下，梁振英特首帶領特區政府穩健施政，在土地房屋、安老扶貧、科技創新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顯進展。全體港人都要堅定發展的信心，以「一國」的定力啟動「兩制」的活力，讓「一國兩制」的紅利更大釋放。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2016年對香港來說，是不平凡的一年，發生了包括農曆新年「旺角暴亂」、2月份新界東補選、9月份立法會選舉、10月立法會議員的「宣誓」風波等一系列事件。在大是大非面前，梁振英特首和特區政府堅守「一國兩制」和法治底線，嚴格按照基本法、人大釋法和特區法律辦事，依法打擊和遏制「港獨」勢力。

「港獨」思潮一日不根除，對「一國兩制」的衝擊及對香港的危害都非常嚴重，未來特區政府工作必須按照習主席提出的要求，團結廣大港人，繼續全面清除「港獨」對香港的負面影響，尤其是要加強教育青年一代，樹立國家民族觀念，從根本上剷除「港獨」滋生的土壤。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維護國家統一和保持社會政治穩定，是香港特區必須承擔的神聖職責。「堅決維護國家統一、保持社會政治穩定」，是根據香港政治現實對特首和特區政府提出的工作要務，只有全面貫徹落實這個要求，才能真正落實好「一國兩制」，把香港的事情做好。